

从“他者化”到“对话”：

弗兰克·麦吉尼斯《会有人看顾我》中的身份建构与协商

姜依玲¹

(1.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以黎巴嫩人质为题材的戏剧《会有人看顾我》是弗兰克·麦吉尼斯的代表作之一。剧中三位西方人质通过对东方的“他者化”，特别是通过对阿拉伯女性的性别化想象和对阿拉伯世界的暴力化描述，强化自身作为西方集体身份的优越性。同时，麦吉尼斯还挑战了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探讨了在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复杂性和交织互动，并提出了它们之间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他通过作品展现了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同时也揭示了这些冲突背后蕴藏的相互理解与共存的空间。

关键词： 弗兰克·麦吉尼斯；《会有人看顾我》；他者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31

一、引言

弗兰克·麦吉尼斯 (Frank McGuinness) 是当代爱尔兰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他的作品广泛涉及爱尔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以其戏剧作品尤为闻名。他的写作风格融合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和细腻的情感描绘，常常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和冲突展现主题。他擅长通过展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爱尔兰的历史和政治。麦吉尼斯曾获得爱尔兰艺术委员会奖、苏格兰皇家话剧奖等多个奖项，是当代爱尔兰文学的重要人物。

《会有人看顾我》(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是麦吉尼斯最著名的戏剧之一，基于真实事件创作，讲述了三名西方人，分别是美国人亚当 (Adam)、爱尔兰人爱德华 (Edward) 和英国人迈克尔 (Michael)，被恐怖分子绑架并关押在黎巴嫩的故事。三位囚徒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痛苦，还要应对心理上的压迫和精神上的崩溃。麦吉尼斯通过三位囚徒的多重身份和复杂关系，揭示了文化、宗教与民族间的张力，同时反映出极端环境中对归属感的渴望。剧中对话不仅展现情感宣泄，还折射出西方与东方间的深刻对立与误解。然而，通过人物的反思与情感联系，麦吉尼斯展现了跨文化和解的可能性与共通人性。

约瑟夫·伦农 (Joseph Lennon) 曾梳理了 18 世纪至 20 世纪上半叶爱尔兰文学作品中对东方的想象性再现，尤其是“凯尔特人与东方之间叙事联系的发展”^[1]，地理位置上处于西方但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爱尔兰在某种程度上和东方处于相同的处境。三上弘子 (Hiroko Mikami) 拓展了这一观点，并将其延伸到《会有人看顾我》这部剧中进行讨论，他分析了此剧的刻板印象设定，即爱尔兰人与英国人之间典型的敌对关系，以及美国人可能提供的调解。他认为这种模式使麦吉尼斯能够深入刻板印象形成的底层文化逻辑，以“发现他们民族特性的真相与神话”^[2]。他们对这部剧的讨论多聚焦于三位西方人质内部的身份矛盾，尤其是英国、爱尔兰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反映殖民历史和文化矛盾，较少涉及东方在这一叙事中的主动性及其与西方的互动，以及对剧中失语的角色，即阿拉伯绑匪的探讨较少。海伦·洛杰克 (Helen Lojek) 触及了对失语的阿拉伯绑架者的身份讨论，分析了西方人质将阿拉伯绑匪“他者”化的过程^[3]，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灵感。三位西方人质试图在东方环境中保持自我认同和文化优越感，他们的困境与被作为东方的“他者”所束缚的情况象征了西方对殖民地的控制与依赖。此剧不但涉及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刻板印象的建构，还包含了以阿拉

作者简介：姜依玲 (1997-)，女，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为 20 世纪爱尔兰文学。

伯为代表的东方对西方的反抗,以及麦吉尼斯尝试在文本中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努力。

由此,本文拟通过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探讨《会有人看顾我》中的“东方他者”形象,探讨西方如何通过性别化和暴力化的手段刻画阿拉伯女性以及阿拉伯文化,从而强化对东方的刻板印象。这种通过“他者化”来重塑身份的过程,展现了西方文化如何通过与东方的对立建立自我认同。随后,麦吉尼斯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进行了挑战,探讨了在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的动态构建中,东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对话的可能性。

二、性别化与暴力化的“东方他者”

在《会有人看顾我》中,三位被绑架的西方人质迈克尔、爱德华和亚当,通过对东方女性及阿拉伯文化的描绘,构建了一个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东方”形象。这种形象不仅强化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二元对立,还折射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所揭示的关于东方女性与伊斯兰教的一系列负面刻板印象。在文本中,这些“东方”形象既以性别化的方式体现为对阿拉伯女性的异化与性幻想,也通过虚构的叙述揭示了对阿拉伯世界的敌意与文化偏见。

爱德华对阿拉伯女性的性幻想生动体现了赛义德所批判的西方对东方女性的性别化想象。在剧中,爱德华以调侃的语气说道:“我对一个阿拉伯女人有过幻想。她只穿了一件面纱,而我穿了条草裙”^{[4]100}。这一看似轻描淡写的陈述,实则蕴含了深刻的文化意涵。面纱作为东方女性的典型象征,在爱德华的幻想中被抽离了其原本的宗教与文化意义,转而成为一种激发男性欲望的性化道具。草裙这一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意象,则进一步将幻想置于西方对异域他者的文化想象之中,呈现了一个被物化为感官享受对象的东方女性形象。正如赛义德所言,东方女性往往被描绘为“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5]207},其形象从属于男性的欲望与视角,而她们的主体声音却始终被压制。

这种性别化的东方女性形象不仅凸显了西方男性凝视下的文化霸权,也暗示了西方文化在建构自身身份时对“他者”的依赖。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指出,殖民语境中的他者化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模糊性”的生成。他者被刻画为“异己的熟悉”(the familiar other),即既是陌生的、威胁的,也是必要的和依附的^{[6]122}。这种模糊性使得东方形象在西方幻想中既被性化,又被工具化。在这场幻想中,爱德华通过“她很放纵。我喜欢这样”^{[4]100}的评价,将东方女性描述为放荡和野性,并与西方女性进行了隐性对比。当亚当随即回应“我喜欢美国女孩”^{[4]100}时,文本中无形中构建了一种文化对照:东方女性是感官的、异域的,甚至是危险的,而西方女性则被隐喻为纯洁、自控和熟悉的。这种二元对立不仅加深了西方对东方的性别化理解,也为三位人质在极端处境下建构自我身份提供了心理支撑。他们通过物化东方女性,获得了短暂的优越感和身份确认。此外,这种幻想也反映了三位人质在极端环境中应对孤独与无助的一种心理机制。爱德华选择幻想阿拉伯女性,并非仅仅是为了调侃或娱乐,其背后隐藏着一种对现实环境的不满与自我逃避。作为囚徒,他们的身体被禁锢,行动被限制,而幻想成为他们重新确立自我存在感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女性形象被用作他们情感与心理的投射对象,她们的“异域性”和“神秘感”满足了他们对自由和掌控感的渴望。

除了将东方女性的形象性别化,三位人质通过想象的电影情节对阿拉伯世界进行描绘,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敌意与文化偏见。这一情节由一位修女在贝鲁特的遭遇展开,她象征着基督教的仁慈与纯洁,孤身前往战乱中的黎巴嫩,肩负传播信仰与援助孤儿的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她用歌声安抚孩子们的心灵,展现出一种理想化的西方救世主形象。然而,这位修女最终遭到阿拉伯“敌人”的枪杀,她的吉他也被打碎。这一虚构的情节将修女的无辜与阿拉伯人的暴力对立起来,通过二者的鲜明反差强化了西方的道德优越感。在赛义德的理论中,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始终伴随着暴力与不文明的刻板印象,东方被塑造成一个需要拯救的“问题区域”^{[5]40}。剧中三位人质所构想的修女形象,正是这一传统的延伸:她不仅象征着西方的善良与文明,更通过她的悲剧遭遇突出了东方的野蛮与残酷。

后殖民主义学者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在《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指出,殖民语境中被支配的“属下”往往被剥夺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他们的形象是由殖民者建构的,缺乏主体性^{[7]292}。在这部剧中,修女的死亡及其意义完全由三位人质叙述构建,而阿拉伯人的形象则被定格为暴力与野蛮的符号,这种“替代性的叙述权”正是殖民权力关系的体现。修女被杀害的场景在剧中被详细描述:“秃鹫盘旋在修女的尸体周围”^{[4]110},这一细节通过对死亡与血腥的强调,将阿拉伯人非人化,并进一步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暴力认知。

这种刻板印象的构建,与剧中三位人质的身份处境密切相关。作为囚徒,他们的生命与自由掌握在绑架者手中,这种极端的权力失衡迫使他们试图通过贬低绑架者来重建心理上的力量感和自尊心。修女的故

事情正是在这一心理动机下生成的：通过想象阿拉伯世界的野蛮与基督教的高尚对比，他们得以暂时忘却自己的困境，重新确认作为西方人的身份优越性。然而，这一虚构的情节也暴露了西方叙事的单一性与偏见。在修女的形象中，东方被描绘为绝对的“他者”，不仅缺乏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可能性，甚至成为一种纯粹的威胁。这种叙事忽略了东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其简化为暴力与敌意的代名词。正如赛义德所批评的，“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在这种力量关系下“产生了关于东方的话语”^{[5]5-6}。剧中的修女故事情节无疑延续了这一传统，同时也成为三位人质身份建构与心理调适的重要媒介。

三、殖民者身份的重建

迈克尔、爱德华和亚当对阿拉伯文化的贬低与敌视，也直接服务于他们在囚禁处境下的身份重建。在被剥夺自由和尊严的极端环境中，三位人质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角色确认自己的存在。他们转而通过对绑架者的“他者化”来重新定义自身，强化集体身份。这种身份的构建和确立，正如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所言，是“在特定权力模式的作用下，通过差异标记和排斥产生的”^{[8]4}。

迈克尔、爱德华和亚当通过语言和想象，将阿拉伯绑匪定义为与自己完全对立的“他者”。当迈克尔询问爱德华“他们是谁？”时，爱德华简单而笃定地回答：“敌人”^{[4]105}。这一语句不仅表明了三位人质对绑架者身份的统一看法，也突显了二元对立思维的植入——绑架者被等同于“敌人”，进而成为三位人质建构集体身份的参照点。在西方的文化框架中，“东方”常常作为“野蛮”“危险”的化身，与“文明”“理性”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迈克尔作为英国人，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谈论绑架者，宣称“他们的无礼让我目瞪口呆”^{[4]139}；而爱德华作为爱尔兰人，虽然拥有被英国殖民的历史记忆，但在面对东方时，他仍然选择认同西方的文化优越性。亚当则以美国人的身份，将“阿拉伯人”视为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存在，甚至在玩笑中说“我是美国人，我是阿拉伯人，我完蛋了”^{[4]119}，以强调两者间无法调和的对立。三位人质在极端环境中的身份建构，凸显了“西方人”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如何通过“他者化”来重塑自我认同。

由于身处困境，三位人质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因此，他们转而依赖对绑架者的贬低和污名化，试图在心理上重新确立自身的优越性。这一过程中，阿拉伯绑匪被描绘成没有个性、缺乏理性的群体，完全被三位西方人质的话语所定义。他们几乎没有独立的声音，而是通过西方人的叙述被简化为“粗俗”“残忍”“无礼”的象征。这种“他者化”不仅是权力的体现，更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在极端环境下，三位人质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感受到无力与羞辱。通过将阿拉伯绑匪视为“野蛮人”，他们在内心深处重新构建了一种虚幻的权力平衡，获得了对自我身份的安慰与肯定。当迈克尔说“如果我们堕落到粗俗的程度，那就是向他们屈服”^{[4]113}时，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设立界限，通过对绑匪的持续贬低，三位人质在压抑的环境中获得了片刻的心理慰藉，同时也让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无形中得以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三位人质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的集体身份。这一身份建构既体现了权力关系中的差异，也反映了极端环境下对归属感的渴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认为，集体身份的形成通常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即一种超越个人实际联系的共同认知结构^{[9]6}。在本剧中，这种“西方人”身份的想象性尤为突出，它不仅建立在共同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之上，更通过对“他者”的排斥来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在身处异国他乡的困境中，三人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充满矛盾和张力，但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使他们意识到彼此间更深层次的共同点。与绑架者的对立，成为他们暂时消除彼此差异、凝聚集体身份的重要契机。尽管爱德华常因爱尔兰的身份而被英国人迈克尔讥讽，但在面对绑架者时，他依然选择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进行反击。这种身份的模糊性和多重性，既表明了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复杂性，也体现了麦吉尼斯对身份问题的深刻洞察。剧中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不断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徘徊，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动态本质。

赛义德曾言，“欧洲通过将自己与东方对立，作为一种替代甚至潜意识的自我，获得了力量与身份认同”^{[5]3}。三位西方人质通过重塑绑架者的形象，间接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话语权。爱德华对绑匪的评价，以及迈克尔对文明与粗俗的界定，实际上是西方叙事对东方世界的再现与重塑。然而，正是在这一话语权的争夺中，三位人质也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性。他们的语言虽然试图表现出优越感，但在极端环境下的恐惧与无助感却始终难以掩饰。这种矛盾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复杂，也为后文讨论麦吉尼斯对传统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解构埋下伏笔。

四、跨越对立：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与文化对话

在《会有人看顾我》中，麦吉尼斯巧妙地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与互动，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误读与扭曲，同时也通过将三位西方人质置于被剥夺自由与尊严的弱势地位，即通过描绘阿拉伯绑匪对三位西方人

质的反向“他者化”过程,展现了麦吉尼斯对这种传统二元对立结构的颠覆和解构。同时,这部戏剧并未止步于这一层面的反抗,通过三位人质与阿拉伯绑匪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这部作品还展示了东西方之间理解与和解的可能性。

在本剧中,阿拉伯绑匪与三位西方人质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双方对彼此的“他者化”,即双方将对方看作一个不可理解、异质且威胁性的存在。阿拉伯绑架者在劫持爱尔兰人爱德华时,完全无视其所代表的爱尔兰中立身份。美国人亚当曾言:“你是爱尔兰人,来自一个中立国家。他们会放你走的”^{[4]93}。就现实情况而言,爱尔兰是一个未卷入中东冲突的中立国,按理来说爱尔兰人不应成为绑架的目标。然而,阿拉伯绑架者的行为却深刻体现了他们对所有西方人的一致看法——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爱尔兰人,他们都是具有白皮肤和蓝眼睛的“西方人”,在阿拉伯人的眼中,这种身份意味着“他者”,是一个统一的、具有威胁性的群体。正是这种对“西方”的单一化与抽象化,导致了爱德华的被捕。爱尔兰人虽未直接参与中东的冲突,但他依然被视作“西方”的代表,因此成为了目标。阿拉伯绑架者的做法表明,西方世界在东方眼中是一个统一且具有威胁性的“他者”,这种文化上的单一化视角与西方对东方的二元对立是相互呼应的。

另一方面,三位西方人质在剧中也被阿拉伯绑匪抛入身为“他者”的处境中。三位人质被剥夺了行动自由,身陷险境,无论是身体上的禁锢,还是精神上的折磨,都让他们体验到“他者”的被动身份。亚当的恐惧更为具体,他痛苦地描述了绑匪可能对他施加的性暴力:“他们要用油涂我的屁股,然后让我死掉。他们会用油弄死我”^{[4]168}。在这种极度无力和脆弱的境遇下,西方人质与他们所视为“敌人”的阿拉伯绑架者之间的对立被进一步激化。通过这些描写,剧中展现了被置于“他者”位置的西方人质的痛苦,他们不仅被剥夺了行动自由,还在极度的非人道环境中面临身份与尊严的完全丧失。无论是在阿拉伯绑匪的眼中,还是在三位西方人质的眼中,对方都是一个需要被控制、对抗甚至摧毁的“他者”。

通过反向“他者化”三位西方人质,至高无上的西方特权得到挑战,但麦吉尼斯并未止步于此,他通过三位人质与阿拉伯绑匪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三位人质对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的尝试理解,展示了东西方对话与和解的潜在可能性。最典型的是三位人质通过阅读《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对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产生了新的理解,这使他们逐渐打破了对阿拉伯文化的刻板印象。赛义德提出,西方知识体系长期以来通过塑造对东方的“他者”概念,强化了东方文化的异质性与敌对性。这种文化二元性往往以“西方—理性与进步”与“东方—神秘与倒退”的对立表现出来^{[5]41}。然而,亚当在阅读《古兰经》后,逐步理解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共通之处,尤其是宽恕与仁爱的理念。他在剧中感慨道:“宽恕我吧,我的兄弟姐妹们,宽恕我把你们当成敌人。在你们的圣书里,隐藏着力量与和平的道路”^{[4]120}。这一转变表明,尽管三位西方人质身处困境,他们通过学习与反思,逐渐对阿拉伯文化产生了理解与宽容。因此,“文化认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中不断被重构”^{[6]123}。这种接触与对话的过程打破了文化间的对立与偏见,推动了跨文化理解的深化。在这种互动中,西方个体的认知不仅可以被重新塑造,甚至可能转变为一种更加包容与多元的视角,这一视角能够挑战原本对伊斯兰文化的排斥态度。

此外,剧本中的一个重要场景是三位西方人质想象着与阿拉伯人一起庆祝婚礼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他们不仅设想了与绑架者之间的对话,还想象了一个跨越文化差异、充满欢声笑语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邀请他们参加派对吗?……想象一下这是一场婚礼……大家唱歌,讲故事。这是全世界共有的场景。喝一杯吧,如果你愿意,我们不会告诉别人。加入我们吧”^{[4]137-138}。在这一婚礼场景中,东西方不再是对立的、不可逾越的文化体系,而因共同的人性与价值观走向团结与和解。正如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在《无用的共同体》(*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中所提出的:“共同体并非通过身份的同一性或传统的连续性来定义,而是通过共享存在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得以构建”^{[10]25}。这一场景通过婚礼这一象征性仪式展示了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它并不是依赖于文化的完全融合,而是在差异性中建立的理解与联系。此外,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看来,人类的脆弱性使我们暴露于他人的行动和影响之下,这种暴露性不仅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建立社会联系和共同体的可能性条件”^{[11]22}。剧中的婚礼设想展现了人类基于脆弱性和情感的共同性,揭示了冲突中的和平可能性。这一设想表现了剧中人物的转变,他们逐渐理解到,虽然有着深刻的文化差异,但人类对和平、爱与尊重的追求是共同的。这一场景象征着一种希望,即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并非无法跨越,反而可以通过对话与理解化解矛盾。

五、结语

通过对《会有人看顾我》中东西方文化对立与对话的分析,本文揭示了弗兰克·麦吉尼斯如何在剧作中既批判西方“东方主义”对东方的误读与刻板化,同时又通过对话与互动展现了东西方和解的可能性。剧中人物在面对“他者化”的身份与压迫时,并未止步于反抗与对立,反而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与文化理解,逐渐破

除了自身的偏见，开始寻求一种跨越文化隔阂的对话模式。在这种对话中，尽管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但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与人性关怀，东西方的敌意与误解有可能被化解，向和解与团结的方向发展。剧中阿拉伯绑架者与西方人质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三位人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转变与想象婚礼的场景，象征着一种理想化的和解愿景。然而，尽管剧中展现了和解的潜力，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当前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深刻文化与政治冲突。今日世界，尤其在 globalization 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依然是冲突的根源之一。恐怖主义、移民危机、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依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着深远影响。正如《会有人看顾我》所展现的那样，东西方之间的敌意并非无法跨越，通过增进对对方文化的理解、打破固有偏见，或许能够为缓解当前的文化对立和冲突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LENNON, J. *The Celt and the Oriental: The Narratives of Irish Orientalism* [M]. Dis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2000.
- [2] MIKAMI, H. *Frank McGuinness and His Theatre of Paradox* [M]. Buckinghamshire: Colin Smythe Limited, 2002.
- [3] HELEN L. The Diverse Dramatic Contributions of Frank McGuinness [C]// *Irish Theatre in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Donald E. Mors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91-204.
- [4] MCGUINNESS F.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M]. London: Faber, 1992.
- [5] SAID E. *Orientalism* [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 [6] BHABHA H.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7] SPIVAK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C]//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ited by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6-111.
- [8] HALL S.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C]//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6: 1-17.
- [9]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M]. London: Verso, 1983.
- [10] NANCY J.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11] BUTLER J.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M]. London: Verso, 2004.

From “Othering” to “Dialogu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in Frank McGuinness’s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Jiang Yiling¹

1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Lebanese hostage crisis,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stands as one of Frank McGuinness’s most acclaimed works. In the play, three Western hostages reinforce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collective Western identity through the “othering” of the East, particularly by projecting gendered fantasies onto Arab women and depicting the Arab world through images of violence. At the same time, McGuinness challenges traditional Western binary modes of thinking by exploring the evolving dynamics of power and identity. He reveals the complexities and intertwined interaction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while envisioning the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m. Through his portrayal of cultural conflict and collision, McGuinness ultimately uncovers the potential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existence beneath these tensions.

Keywords: Frank McGuinness;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Other